面具背后

胡雪桦

近日,“三星堆”遗址考古又获重要发现。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走近“三星堆文化遗址”是2006年,也就是电影《兰陵王》拍摄完成的十年以后。当我进入主殿大厅,镇馆之宝“金面具”一下吸引了我的眼球,因为,它和《兰陵王》的面具太像了。十年前,在拍摄此片时,“三星堆”还没有对外展示。这是巧合还是天意?

三星堆的图腾和电影《兰陵王》里的图腾都有“凤文化”的基因,它们都崇尚“鸟”,兰陵王的面具和三星堆的面具相似也就完全是情理之中了。我们华夏子孙一直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其实,我们也是“凤的子孙”。《兰陵王》是第一部以凤文化为叙事背景的电影。

《兰陵王》出自唐朝的一个歌舞小戏《兰陵王破阵曲》,它和另一个戏《踏摇娘》的出现,才让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戏剧——诗、歌、舞有了统一演出的样式。唐代崔令钦《教坊记》云:“大面出北齐,兰陵王长恭,性胆勇而貌若妇人,自嫌不足以威敌,乃刻木为假面,临阵著之,因为此戏,亦入歌曲。”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以《旧唐书·音乐志》记 载云:“代面出自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貌美,常著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镛城下, 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麾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讲的是南北朝北齐兰陵王长恭,因貌美不能破敌,制一面具上阵,战无不胜。在这个失传的戏剧故事里,对于这副面具的描述吸引了我。这是一副木质的面具,没有防范刀枪剑戟之功能。面具制敌在于它的威慑力量。这是心理学的面具,具有美学功能的面具。

在夏威夷大学读博士时,我在James Bronden教授的办公室,看到了《兰陵王》在日本的演出剧照及兰陵王的“面具”。教授告诉我,此剧在日本的“能乐”中完好地保留了下来。我顿时萌生了要把“兰陵王”从历史的尘封里发掘出来的念头,让现代观众看到这部中华古老的戏剧文明的遗产。于是,有了“兰陵王”的戏剧演出和电影问世。

当然,重新讲述这一古老的故事,自然存在一个重新审视的问题,不能仅仅是重复过去的“兰陵王破阵曲”,必须重构,否则,就失去了“再现”的意义了。戏剧演出《兰陵传奇》,我紧紧抓住了“面具”与人的关系做文章;电影《兰陵王》,我把它放在了“凤”文化背景中。

《兰陵王》是第一部涉及凤图腾文化的中国电影,讲述了一个关于人、神和自然的故事。十五岁的兰陵受成人洗礼后,上阵迎敌,被异邦首领讥嘲他的俊美,不想与他交战。在部落被攻破、母亲被奸污后,兰陵给自己戴上了一副狰狞的面具。他打败了敌人,但再也脱不下面具。为了拯救兰陵,母亲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兰陵复活了,母亲却消失了。

这是一个关于人与面具的故事。艺术的起源来自宗教礼仪(Ritual)图腾崇拜。无论是古希腊戏剧还是我们东方的戏剧,都是源于人对神及大自然的敬畏和膜拜。从古至今,面具一直是人与神沟通的媒介,人只有借助面具,才能同神进行交流。这就有了电影里“面具”和“兰陵”相互存在和感应。兰陵王生长于一个充满了图腾崇拜的时代,自然和人是一体的,人像是从这块土地里长出来的,人对神的崇拜是天生的。人是沧海一粟,冥冥之中,神总是在注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面具-人-神,电影《兰陵王》提出了一个“人格”的问题。今天面具的佩戴,除了化装舞会、戏剧演出,仅存于少数地区的祭祀活动中,如日本的花祭、藏戏、傩戏,非洲的仪式、南美的祭礼,但是,无形的面具,无处不在。可当人意识到,想把面具脱下来,把自己和制造出来的“人格面具”进行分离,那就得伤筋动骨,生死存亡。人在社会生存之中如何来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这是每个现代人面临的问题。就是荣格所说的“人格面具”,面具掩盖了人的本来面貌、人的本性,使人世间多了一分危险和困惑。兰陵有形的面具戴上去脱不下来,直到母亲的血祭和牺牲才使他重新苏醒得以解脱——这是艺术的隐喻与象征。

人类要直面人生,是何等的艰难、需要何等的勇气!电影《兰陵王》里“面具”构成人性的“异化”悲剧是逆接千古、横跨当下、绵延未来的警示。

我的抗疫新角度

景在平

疫情期间,自己作为一个血管外科的老兵,冲到前沿,参与检测,诊护患者,均未获得实战机会。只好行于未行,为于无为,不添乱,即贡献。

封控于斗室,有三个角度可供选择。一个是180度躺平,这是个易选易行的角度,但不是我想要的角度。定期躺平,仅是为了仰卧起坐。反之为平卧180度,更是为了完成俯卧撑。忽然悟到,生命者,俯仰之间也。

第二个角度是直立90度。直立的延伸一是走,二是跳。行走于斗室,可方可圆,渐参顿悟,外方内圆至外圆内方,头圆脚方至天圆地方。生命者,方圆之间也。

跳是直立的纵向延伸,自然就让人想到舞蹈。手舞之,足蹈之,不过是在音乐中行走的变种也。有节畅于呼吸,有律酣于心跳。还真有了那么点“一日不舞,生命辜负”的感觉。

想到自己平时创行的“五站式工作法”:手术站着,查房站着,教学站着,门诊站着,书画站着。为了不废武功,斗室之中,尽量多练“站桩功”。脑子里总倾慕火箭发射前的直立状态。静立是为了一飞冲天。

第三个角度就是45度。前倾45度,是一个保持随时进击的姿态。后仰45度,是一种想要后空翻的姿态。保持微妙的平衡,维持适度的张力。只能前后持稳,不能左右摇摆。动静之间,方向决定速度。言行之间,心态决定姿态。

三种角度,横如伏弩,纵若发机。45度恰是:引而未发,跃如也。

封控斗室,自有目标:重量要下来,力量要上去。落实是关键:少吃一口是大智,多动半步是大志。自四月十二日封至六月十二日解,两个月体重从70公斤降至65公斤。标准俯卧撑和仰卧起坐能各完成20个。虽微不足道,但还是禁不住道来,聊以自慰自励,聊供您一调一笑也。

谷崎润一郎与钱瘦铁

钱 晟

美学大师谷崎润一郎写了那么多庭院、家宅陈设,他自己家到底是怎么布置的?作为东大外文系毕业的精英,他的书房陈设是西式的还是日式?他喜欢什么风格的书画作品?想要知道这些,就不得不提谷崎先生曾经住过7年的“潺湲亭”。

1946年,谷崎润一郎移居京都南禅寺下河原町,门前是南禅寺,屋后是水流潺潺的白川,得名潺湲亭。

3年后,谷崎搬至他在京都最后的旅居之地,同样名为潺湲亭。潺湲亭矗立在糺之森的阴翳之下,倾听着鸭川的流水潺潺。“搬家狂魔”的谷崎一生搬家40多次,却在这里度过了7年的时间,对他而言不可谓不久。1956年谷崎把宅子卖给了日新电机,搬至热海疗养,潺湲亭也就变成了现在的石村亭。但由于与谷崎约定着要保持原状,如今还维持着当初的氛围。

“美,不存在于物体之中,而存在于物与物产生的阴翳的波纹和明暗之中。夜明珠置于暗处方能放出光彩,宝石曝露于阳光之下则失去魅力,离开阴翳的作用,也就没有美。”

“我们不是在事物本身中发现美,而是在阴影、光明和黑暗的模式中发现美,这两者是对立的。”

《阴翳礼赞》中的趣味和美感,是在欧美文明的强光照耀下对谷崎润一郎所属文化的回眸,是他人到中老年后的结果,就像阳光下转身后发现的阴影,呈现出有层次,有景深,有厚度的感受,所以动人。他的这种审美也反映在其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作为一位影响了不止一代人的美学大师,谷崎润一郎对于美,对于日常,无疑是特别敏感的。学者大野修作先生的著作中曾提到谷崎润一郎对于他自己著作里盖的“检印”(即日本的著作版权页上盖的印章)是非常讲究,更不用说对于住所斋名的题写了。

谷崎润一郎应该是在京都白沙村的桥本关雪先生那里知道钱瘦铁的吧。桥本关雪先生对于钱瘦铁欣赏书篆画艺术,在白沙村暨桥本关雪纪念馆里藏有多枚钱瘦铁为其所刻的印章,及为其收藏的题款等。想来,谷崎见之闻之也为之倾倒,所以,特别拜托朋友请钱瘦铁为他题斋号“潺湲亭”并刻斋名章吧。1946年11月3日,当谷崎按约定前往白沙村庄的时候,钱瘦铁已写好了“潺湲亭”斋名,并告之因过几天要回上海,等回去刻好斋名章后,来年春天赴日时交付。

如今,在昔日谷崎润一郎的书斋中央仍悬挂着当年钱瘦铁挥毫的篆书匾额“潺湲亭”。

水流云在。

走进向阳处

若 尘

时光如白驹过隙,不觉三十多年过去了,但这件事如同镌刻般留存于我的记忆深处,不能忘怀。它像一团带刺的玫瑰,滋养着我的生命,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教会我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

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涉世未深的黄毛小伙,在老家一个偏远的乡镇上班。也许是造化弄人吧,我见数字头脑就发胀,却偏偏摊上了一份整天与数据报表打交道的差事。我日思夜想着跳槽,怎样逃离苦海。

终于有一天,我的境遇引起当地一位带“长”字号领导的同情,他表示愿意帮我。他是当年我见过的最大的官——现在想来,他的职位其实并不高,但在当地可称得上是个人物,而且掌握着一定的话语权。

我当即召集身边一帮“乌合之众”召开诸葛亮会议,于酒酣耳热传杯送盏间达成一致意见:“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紧紧把握机遇,主动出击,并指出我之所以多年跳槽失败,均因我“办事力度不够所致”。力度如何加大法呢?众口一词:有钱能使鬼推磨,送钱呗!

我乃一介书生,除了能涂抹几首歪诗,实在无其他歪才。送钱,即行贿也,非君子所为。我辗转反侧,眼珠子盯着天花板骨碌碌转,身子似浮于半空的无线玩偶飘呀飘。经过九九八十一次的权衡利弊,最终还是决定冒一次险。

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临出家门,我一个踉跄险些跌倒,竟然两腿发软迈不开步。

敲开领导的家门,他正在吃晚饭。当着领导爱人与小孩的面,我不敢轻举妄动。我知道这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我要寻找一个与领导单独相处的机会。我紧张地坐在一边等候时机,插在裤兜捏着如同火药弹似的牛皮信封的手,有类似蚂蚁或小虫子在爬动——那是浸出的湿漉漉的汗啊。

在这位领导从卧室隔出的会客厅里,我们面对面坐着喝茶,聊得十分舒畅。说到动情处,我们一度忘记了彼此的身份,打哈哈拍大腿,茶杯掼于桌上溅一身茶水,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样推心置腹。我终于逮住机会向他倾吐郁积心中多年的不得志,面对他随和得没一点官架子的风范,我好几次几乎动摇了今晚与他见面的初衷。但友人对我的“教诲”,以及世俗的种种见闻,坚定了我的信念。

起身握别时,我脑子刹那间空白,惊慌失措中居然精准无误地完成了将裤兜内牛皮信封传递到对方手心系列高难动作。可是,当我恍然明白过来时,牛皮信封又奇迹般回到我的手心攥着。这样的结果,是我不愿意看到的,而且与我的意愿完全相反。陷入尴尬境地的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罐。更让我无地自容的是,他不但不责怪我,还紧紧握住我的手,语重心长地开导我:“你的心情我理解,但绝不能这样做。”

恍惚之间,我陷入一种莫名的情绪中不能自拔。我用世俗的行为,伤害了一个曾经想帮助我的长者。我觉得跳槽已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不应该对不起像他这样的人。我像一个在上辈面前犯了错的孩子,无颜面对。我逃离了领导敞开的家门。

当晚无眠。窗外清澈的天空悬挂着一轮明月,洁白的月光倾泻而下,给大地和树木镀上了一层银辉。我坐在书桌前,在一张洁白的卡片上,胡乱地涂抹着,画了一条高高举起长长的鞭子;诗很短——其实也称不上诗,就那么几句:“对你的敬重/一遍又一遍/鞭打我/太多太多的无奈/不能自拔/只得/将这份美丽的愧疚/折叠成希望/珍藏心底。”

我将诗抄在卡片上,连同那条“高高举起长长的鞭子”悄悄地寄给那位领导。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找过他。我明白了做人一个最浅显的道理:改变人生命运与不如意,不应该走歪门邪道,应该靠自身的努力去争取。

多少年过去,每当空闲下来,无端想起这件事时,仍然使我羞愧难当。值得庆幸的是,当年我遇对了一个人,那位带“长”字的领导用做人为官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帮助一个年轻人,走出了世俗的暗面,走进人生旅途的向阳处。

(书法)毛节民

在命运的盲盒里,勇敢放进自己的梦想

崔 妍

叮咚!一大早手机就响了。打开一看,是老家的同学群。原来今天是全国高考日。按照惯例,我要给今年参加高考的小辈送个祝福。因为在老同学眼里,我是个高考的幸运女孩,他们要“沾点喜气”。

我的高考发生在30年前。那时高考,比起上场考试,有个更刺激的环节——报志愿。当年报志愿叫作盲报,也就是高考还没开始,你就要填好去哪。你不知道考题难度,没有估分,完全靠胆量。除了头部学生,对大多数人来讲就是一场人生豪赌。

高中的我,是个很别扭的小孩。身为工厂子弟,人人学理,我非要学文科;文科同学都抢着报财经、外贸,我非要学“中文”;大部分北方人求学止步于北京,我又要去几乎没人去过的上海。

预报志愿的时候我写了复旦大学,注重升学率的班主任生气了。她把妈妈叫到学校狠狠批评:“你女儿的成绩根本考不上,这样报志愿的话,搞不好滑到大专去了。学习比她好的都不敢这么报,复旦全省才招几个人……”

回家的路上,妈妈把道理揉碎了掰烂了给我讲,从我的成绩到就业。“老师说的税务学校、财经大学不是都很好吗?毕业直接回厂,工作也体面……”一直说到夜里12时许。

而我想报复旦的理由却很虚无——因为我喜欢作家梁晓声,因为他写了一篇散文《从复旦到北影》,因为我想去那个秋天穿毛衣和短裙的地方看看……

第二天我顶着哭红的眼睛来到学校。在老师的虎视眈眈下,我还是写了“复旦大学”。

虽然填报了复旦,难免承受老师的压力和同学的嘲笑,17岁的我还是感觉到有些氛围在悄然变化。有时和好朋友一起玩耍,她们会说,呀,你都报复旦了,我们一起背历史吧;有时校园偶遇一个老师,他会说听说你报中文系了,很适合你呀;家里养了多年的君子兰忽然开花了,妈妈说,好兆头呀…气氛已经这么足了,我常常感觉自己已经坐上开往上海的火车,去向那个心念念的地方。

心中有了熠熠发光的四个字,整个夏天都变得异常明亮和清透;知道命运的盲盒里,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想打开的心情甚至有点迫不及待;当自己的意念集中到一个点,仿佛全世界都在帮你发力。

后来的高考,对我而言仿若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第一场我最擅长的语文,我第一个交卷走出考场,天那么蓝,阳光灿烂。

在那个湛蓝的夏天,我从未想过考上会怎样,也未担心落榜会如何,似乎只是亲手把心愿放进命运的盲盒,就已完成了人生的重大任务。那份青涩的自信和淡然,往后的岁月再也不曾有过。

事情的结局你们都知道了。我如愿以偿来到上海。那时的上海,东方明珠正在建起,处处焕发无限活力。我的很多好友,拿着比我高十几分的成绩,不甘心地就读普通大学,他们都笑我说:“看这个命好的,一分儿也没有浪费。”

现在的小朋友,高考已经不是改变命运唯一途径,却好像面临更多的内卷和压力,不敢出错。对于参加高考的小辈,比起“加油啊,考出好成绩”,其实我更想说:“不要担心得失,勇敢一点,一定要在你的命运盲盒里,装进自己最珍贵的梦想,这样你才有机会实现它!”

十日谈

那年,我参加高考

父亲说:“当先生也好。”我终于忍不住了,翻上阁楼,大哭一场……

责编:吴南瑶